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吴月伴：我住在60呎的香港劏房，姐姐却说我过着她想要的生活

我们姐妹一起长大，姐姐去了北京闯荡，失败后回到家乡结婚。我“漂”到了香港，31岁还单身、租房。家人指责我的不婚主义和职业规划，姐姐会站出来挺我。

特约撰稿人 吴月伴 发自香港 | 2017-09-22



姐姐是我大伯的女儿，比我大一岁，我们相伴著长大。如果说我和姐姐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却都在心底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不普通。图：Tsengly / 端传媒

“你过了我一直想过的人生，我一直觉得走出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2015年盛夏的一天夜晚，我和姐姐坐在酒吧里，她埋头用吸管啜着一杯无酒精的鸡尾酒，幽幽地对我说。空气中游荡着炸薯条的气味，一阵得意劲儿快速驶过我的胸膛。

“你还是可以走出来啊，”这话太不走心了，我感到屁股底下的刺绣座垫粗糙而闷热。

“太难了，我老公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我走哪儿都得带着这个拖油瓶，”她像是感到滑稽似的笑了。

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只树懒挂在姐姐脖子上的画面。尽管我俩谁也不确定，这只树懒究竟是拦路虎还是个借口。

后来我弄懂了姐姐的套路——“我可以欺负我妹，但外人不行”

姐姐是我大伯的女儿，比我大一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我妈时不时会拿出来跟我比较的主要人物。她性格开朗，家里没有人不喜欢她。而那时我性格比较内向，在人前的怯场总被解读为郁郁寡欢。我那刻薄的爷爷曾这样评价我——“像是谁欠了她500块钱似的”。

姐姐从小就有一种能力，让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听起来好厉害：学奥数啦，跑接力赛啦，考个一百分啦……“bling bling”地闪着聪明能干的光芒。她是自信的、无畏的，让站在那光芒旁边的我感到晦暗和不被重视。

我至今记得姐姐偷翻出我的日记在家人面前大声朗读，我抢夺未遂，只好躲在洗手间里哭，没有一个大人制止她的行为。

我为此恨了姐姐很久。

可笑的是，我从小学习成绩也不错，在学校也受待见，只是相比于在任何场合都对女儿赞不绝口的大娘，我爸妈低调得令人气愤。在家人眼里，姐姐各方面都比我强。这种印象持续至今。

有天我终于忍受不了我妈喋喋不休地拿我和姐姐作比较，愤怒地怼了回去。我不是她，也不想成为她——我记得我这样和我妈讲的，她后来有没有收敛我不记得了。依我对我妈的了解，很可能没有。

当然，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个怂包。小学时有个朋友常来爷爷家找我玩。那是夏天，爷爷家的阳台上挂着又厚又密的门帘，由一根根橘黄色的珠串构成，我有时会偷偷剪下其中几串送给班里的同学。我那朋友看到爷爷家的门帘，立即当着全家人的面揭穿了我。当时场面挺尴尬的，家里大人一时也不知该接什么话，我更是窘得不敢说话，姐姐却突然站起来：“你胡说，我妹没有！”

我心里对姐姐生出无限柔情，体会到姐妹之间的、凌驾于一些事物之上的联结。后来我弄懂了姐姐的套路——我可以欺负我妹，但外人不行。唉，我也是容易感动。

我和姐姐是相伴着长大的，每天中午在爷爷家吃午饭、睡午觉，下午放学再回到爷爷家一起写作业、一起玩。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东北人，早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南下来到这个西部城市，再也没有回去。我们保留着东北人的饮食习惯和颇为紧密的家庭结构。比如每周末在爷爷家聚餐，也经常一大家子开车出去玩。我记得我和姐姐在机场看飞机起起落落，躺在溪水边的大石头上晒肚皮，围着爷爷他们钓鱼的池塘疯跑……

小学高年级时，我们姐妹俩一度形成联盟，因为我们的三妹逐渐夺走了家人的关注和宠爱，这不公平！我和姐姐给爷爷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指出溺爱对儿童成长的不利影响。爷爷看了信，特别和蔼地教给我们三个字——酸葡萄。

我对姐姐的恨意随着小学毕业慢慢消散。青春期像是炉子上的平底锅，烧化了我的内向、犹疑，我变得更外向和自信。暑假时我们会住到彼此家中，嗑瓜子、喝冰凉的可乐，分享对这个世界的困惑，在深夜里给喜欢的男生打整蛊电话。在一个凉爽寂静的夏夜，我们关了灯，对调着躺在她那张铺了麻将凉席的小床上，她对我说：“我觉得你变开朗了好多，这样挺好的。”

后来姐姐考上本地一所大学读法律，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爸给她买了一个MP3，爷爷则带领一大家子去学校参观。

一年后，我考入一所更好的本地大学。嗯，家里人对大学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



“你过了我一直想过的人生，我一直觉得走出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却在心底觉得自己不普通

姐姐和我的大学都在新建成的大学城里，只隔两站路。她们学校每个宿舍都能洗澡，而且是货真价实的温泉水。我有时去找她洗澡。洗完坐在她的座位上，姐姐拿吹风机帮我吹头发，她温柔而细心，一点也不像小时候那个用拳头捶我的家伙。然后我爬到她的床上睡午觉，姐姐则在桌前学习，等我一觉起来已经到了晚饭时间，我们再一起去吃饭。我至今记得从她床上醒来时的感觉——连指甲盖儿都是松软的。

姐姐一直觉得这所大学配不上自己。她就读的法律系有很多富二代和官二代，姐姐不无羡慕地描述那些豪车停在宿舍楼下的场景，“他们不用学习，毕业了就可以进法院、做公务员。”

如果说我和姐姐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却都在心底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不普通吧。她对我说，我们将来都不嫁人，一起努力工作。我点了点头。其实那时候我对人生没有任何规划，我的大学是在图书馆和篮球场度过的，我读了一堆无用的书、练就了一双结实的小腿，然后就毕业了。

姐姐和一个要好的朋友去了北京，一边找工作一边准备研究生考试。“只有北京才能证明我的价值，”她说。那是2007年，她在一家律所找到一份月薪800元的工作，负责电话推销。朋友说这工资伤自尊，但姐姐很开心，她对我说同事和老板都很喜欢她。她说她去宜家买了好多新家具，组装家具有意思极了。

在家庭聚会上，大娘又讲起姐姐在北京生活的趣事，言谈里皆是得意。那时我刚毕业，进入本地一家公司工作，我的生活又一次在姐姐的光芒下变得暗淡了。我不是没有申请过北京的工作，但是都被拒了。在嫉妒她的同时，我也打心眼儿里为她高兴。

后来姐姐给我讲起北漂的生活，她每天上下班都要花一个半小时，在冬天的地铁里挤出一身汗，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对面大叔的报纸上，她甚至没办法从毫无缝隙的人群中拔出手来擦一擦汗。

第一次考研失败后，姐姐换了一份月入1500元的工作，然后准备第二次考研。当时有个教授对她很好，经常辅导她，有天晚上她和教授吃完饭走在路上，教授突然从后面抱住姐姐，嘴里嚷嚷着喜欢她、可以帮她出国，姐姐跑开了。后来她的面试没有通过。

2008年初的一天夜里，爸爸接到大伯的电话，说姐姐出事了，能不能帮他买最快去北京的机票。据说姐姐突然开始呕吐，无法站立，惊慌的朋友连夜把姐姐送到医院。因为查不出病因，没有科室愿意收留姐姐。大伯赶到医院时，看到姐姐躺在医院大厅的移动病床上，抱住她嚎啕大哭。

北京医院的各项检查排队都要等半个月，大爷便把姐姐带回家乡看病，一查竟是脑梗。姐姐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康复训练，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大病一场的姐姐没有了之前的心气儿，留在本地找了一份做HR的工作。

她后来两次报考全国司法考试，都没通过。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自己要结婚了，对象是在同学聚会上再次相见的一个老同学。她说你还记得么？我们曾经发誓都不结婚呢。

她问，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都很土？我恶作剧地点了点头

我的姐夫在一个油水颇丰的政府部门当司机。他曾和我读同一所中学，他爸爸和我爸爸曾在中学同班。坐落在城市西边的大型国企庇荫了从爷爷那辈开始的一代代人，我的爷爷、奶奶、大伯、大娘、爸爸、妈妈和婶婶都在这家企业工作。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国企下辖的小学、中学读书，我们中的很多人在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又加入了这个国企。

我本能地想要逃离这个体系，尽管我爸曾试图在体系里给我找一份好工作和好丈夫。

我大娘曾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姐姐是她的骄傲，是大学生，是这个家族里最聪明的人；而姐夫虽然家境不错，终究只是个大专生。大娘后来发现自己在女儿婚事上人微言轻，只好答应了。“其实他长得挺不错，”大娘咬牙切齿地说。

结婚后姐姐请全家人到她家吃饭。她住在公务员住的很好的小区里，三室两厅，干净敞亮。看到姐姐和大伯大娘在厨房忙里忙外，姐夫则躺在沙发上，我心里有点不痛快。

那天回家路上，爸爸心中很感慨，他说你要是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了。我爸一直本着“女儿富养”的原则，对我的最高期待是一生平顺不吃苦。也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一点也不想过这样的人生。

那时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倦怠，我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便一边工作一边学英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努力过，压力最大时，我背着单词眼泪就哗哗流下来。

后来我如愿申请到香港一所大学的硕士班，度过了无比愉快的一年。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家乡了。

我和姐姐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她偶尔会问我好不好，还会把家庭聚会的照片发给我看。硕士毕业后我回家歇了几天，姐姐请我吃火锅，她问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都很土？我恶作剧地点了点头，她脸上有点落寞，又追问了一遍，我说开玩笑啦。

第二年夏天姐姐来香港找我玩。那时我住在一间面积只有6平米的劏房里，我的小床只有0.8米宽。姐姐来了我就只能打地铺，房间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姐姐跟我讲，她睡在我的床上，看着还没有她家卫生间大的房子，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做到和我一样，她说她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或许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她装点生活的一扇窗。就算看不到窗外的风景，偶尔念叨念叨也好。摄：林振东/端传媒

姐姐一直没有生小孩，仿佛小孩是她陈规生活的最后一道锁

住在那间6平米的劏房里时，我先后换过三份工作，终于找到一份很喜欢的。我过得很开心，我热爱的工作也在渐渐有起色。

在这个家族里，我突然得到了一些儿时曾渴望的关注和认可。家人都半开玩笑地叫我“港女”，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个词在当地指涉的讽刺意味，他们向我打听香港的情况、追问我的工资。我爸妈有时也会凑热闹地炫耀两句，但他们心底更期待我能过上姐姐的人生，平顺、富足。而我现在的人生，大概是大娘一直对姊姊的期望吧。

事实上，虽然我的工资在家乡人看来很高，但房租和日常开销吞噬了绝大部分。我在家乡的朋友，每个人都过着姐姐和姐夫的生活，有房有车，有妈有娃。有时我会惊异于家乡亲友的消费力，他们来香港找我，住在我的破房子里，却能在铜锣湾的奢侈品店里买下上万元的包包、手表和首饰。眼都不眨一下。

看起来，他们什么都没有错过。

而我31岁了，单身、租房、没养一条狗。春节聚会，姐姐和妹妹都回了婆家，我则作为没有出嫁的女儿陪在爸妈身边。大伯拉着我，半戏谑地说：“到现在还没嫁出去，也要反思一下自身的原因。”

我曾在感到孤独的时刻停下来想过，我错过了家乡亲友们的生活，到底得到了什么？想来想去，大抵是“有趣”——真昂贵的两个字啊。

但是姐姐懂。当家人围剿我的不婚主义和职业规划时，她会站出来挺我。

姐姐后来辗转几家公司，现在是一家国企的高级HR，工资在我们那个三线城市已经很高了。她给我讲她有多么讨厌混吃等死的上级，讲自己如何对抗心机女同事，讲自己的生活是如何地一成不变。她一直没有生小孩，仿佛孩子是她陈规生活的最后一道锁。

“如果当年没有生病，在北京，我相信会比现在更有成就感，”姐姐说。我忽然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或许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她装点生活的一扇窗。就算看不到窗外的风景，偶尔念叨念叨也好。她慢悠悠地谈起对庸常生活的厌倦和无力感，我从她的喋喋不休中看到了一丝得意——一种对现状的撒娇。

今年春节，姐姐兴奋地跟我说，她申请了华为公司的驻外职位，哪怕是去非洲或西亚，她也想要出去走一走。她讲了一大堆充斥着“梦想”、“自由”的心灵鸡汤，我心里有点烦，在涮掉最后一块毛肚后，我从猩红的火锅前抬起脑袋，“说那么多鸡汤干嘛，你想做就去争取。”

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推开那扇窗。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恚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异乡人—胡清心：香港，我和你，在最美好的时间点相遇

我无法想像现在来港就读的陆生是否还能保持我当年的心境，对他们而言，来到香港是进入一场硝烟弥漫的战场的最前线。

异乡人—杨静：我在香港八年，搬了十次家

在有 Airbnb 之前，我已经养成类似习惯：在本地房屋租赁网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样看我租不起的单位……

异乡人——陆颖鱼：旅行中的台湾和移民中的台湾是两件事

嫁到台湾后，香港女生陆颖鱼离开了媒体业，一番折腾摸索，今年才在台北巷弄里开了书店“诗生活”，对于她，香港人梦想中的台北是什么？

异乡人——邹思聪：时代剧变了，而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异乡人——夏目目：抱歉，我要离开香港了

在中产家庭作为（叛逆的）既得利益者长大，我来到香港家具都没买齐，就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社会运动，目眩神迷。